

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纪念“九一八”事变 60 周年

石 钧 编写

4.2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沈阳

前 言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中国近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让广大青少年和人民群众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国情，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为振兴中华而奋斗。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

中国近代的历史，既记载着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富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光荣伟大的革命业绩，也记录了遭受列强凌辱的血泪斑斑的民族苦难。学习中国近代史，既要知道中国革命前辈、先烈创造的丰功伟业，也决不能忘记民族的耻辱记录。前人说：“知耻近乎勇。”列宁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如果忘记了与现实密切相连的近代历史上的民族苦难和耻辱，实际上就是忘记了我们民族固有的坚忍本色、自强精神。历史的惩罚难免要重新降临。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黑暗、屈辱的一页。偌大一个中国，竟让日本侵略者在短短几个月内占领了东三省，而后又轻易地占领热河省，使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隶达十四年之久！在日本侵

略者其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大半个中国遭蹂躏，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无法估量的损失，至今伤痕犹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这种奇耻大辱，中国人民永远也不应该忘记！

值“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之际，我们遵照曾亲身经历“九·一八”事变的老同志的提议和中共辽宁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编写了这本小册子，经省委高教工委和省教委负责同志审阅，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对广大青少年和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的参考资料，请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各界广为利用。不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九·一八”事变 的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绝非偶然，有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必然性。

1、落后的近代中国社会

中国从 1840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起，经过 1857 年的英、法联军侵华战争，1884 年的中法战争，1894 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0 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 1904 年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帝国主义各国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内地驻扎军队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攫取了大批战争赔偿费，并霸占了中国的部分领土，如英国占领了香港，并以长江中、下游各省为其势力范围；日本占领了台湾、澎湖列岛、旅顺、大连，并以福建为其势力范围区；法国占领了广州湾，以云南、广东、广西为其势力范围区；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山东为其势力范围区（后转入日本手中）；俄国则先后攫取了
中国东北、西北边疆多达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

以中国东北为其势力范围区。美国虽然没有占领中国的土地，也取得了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同样的特殊“权益”。于是，中国社会由完全的封建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与国际帝国主义这种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政治形势相适应，国内政治舞台上则形成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从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到国民党新军阀政府的统治时期，全国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为了争权夺势，军阀之间战端迭起，争斗不休。

长期的军阀混战，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深重的苦难。据统计，在1930年为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河南省洛阳等27个县所受的兵灾损失，竟占该地农业常年产值的160.2%，使许多农民家破人亡。严重的天灾也伴随人祸而来。1928年，华北、西北地区发生旱灾，灾区达530余县，灾民达4千余万人。1929—1930年，华北地区遭水灾，西北地区受旱灾，灾区达8百余县，灾民达5千万。1931年，由于长江发大水，好几个省成为灾区，财产损失达20亿元以上。大批灾民活活饿死。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对人民实行镇压，经济上实行掠夺；其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人民

的镇压尤甚。1930年12月、1931年4月和7月，分别出动10万、20万和3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攻。

在实行强权政治的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必然挨打。“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社会这种政治上四分五裂、军事上软弱无力、经济上落后的局面，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2、日本军国主义与对外侵略

日本的情况怎样？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又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日本帝国主义除具有一般帝国主义所共有的特征外，还有其本身的特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经济领域保存着浓厚的封建残余。这种封建性不能不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使其生产技术远远落后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在国际市场上，日本商品的竞争力很弱。于是就依靠军事实力进行掠夺，以弥补经济方面的缺陷。这样，扩军备战和发动对外侵略，就被确定为国家的最高国策，一切政策都要服从于这一目的。与此相适应，军阀势力在

国家机构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表明军国主义居于统治地位。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过渡到帝国主义，是同不断地对邻近各国发动武装侵略紧密相连的。通过发动一系列的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先后占领了中国的台湾、辽东半岛和朝鲜等地。这些地方既是广阔的商品市场和良好的投资场所，又是十分丰富的原料供应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资本主义迅速膨胀起来。据统计，1931年的工业生产总额达51.74亿日元，拥有工厂64,436家，工人数达166.2万人。（守屋典郎：《经济史》，第272页）生铁产量1928年达152.3万吨，钢为228.3万吨，钢材为197万吨。从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中既然尝到了甜头，日本军国主义者当然不会就此止步。他们的最后目的是独霸全中国，第一步是占领中国东北。

3、经济危机加速侵略步伐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危机，以及危机期间日本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形势，加速了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战争的步伐。

1929—1933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首先从美国开始爆发，接着便猛烈地袭击了整个资本主义

世界。日本也未能幸免，被深深地卷入了危机的漩涡。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日本的物价猛跌，1930、1931 两年之间共跌价 30% 以上。对外贸易额锐减，进、出口总额 1931 年比 1929 年下降 40% 以上。工业生产急剧下降，1931 年比 1929 年下降 32.9%。

垄断资本为了摆脱危机，想方设法向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转嫁危机所造成的恶果，大批解雇工人。据不完全统计，1930 年日本有 56.9 万人被解雇，1931 年有 65.6 万人被解雇，造成大量的工人失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急剧降低。同样，农业也受到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由于日本统治阶级向劳动人民转嫁危机，激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抗。加上扩军备战所需的大量军费最终也摊派在劳动者身上，促使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起来，工农运动迅速高涨。

4、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

如上所述，三十年代初的日本，在经济上、政治上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了摆脱困境，将国内矛盾引向国外，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首当其冲的侵略目标，就是中国东北。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非始于“九·一八”事变。早在明治时代初期，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军国

主义分子就开始着手制订一条妄图吞并朝鲜、灭亡中国、称霸亚洲的基本路线，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陆政策”。1874年武装侵略我国台湾，1875年炮轰朝鲜江华岛等事件，就是实施大陆政策的早期侵略行动。

日本的大陆政策，有一个形成、发展过程。日本大军阀山县有朋主持编写《邻邦兵备略》，是“大陆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1879年秋，为了刺探中国的军备情况，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派遣桂太郎等十余名军官至中国，在天津、北京等地进行调查后，起草了对华作战方案。1880年，山县又派十多名所谓“中国语研究生”，在参谋本部军官的监督下，再次到中国进行类似的活动。全面论述中国军备情况和日本侵华行动方针的《邻邦兵备略》，就是根据这两次调查的结果编写的。1880年，山县有朋将这份报告书，连同他亲自写的奏折，一并呈给了天皇。山县在这里反复阐述，为了侵略中国，必须迅速扩充军备，做好进行中日战争的准备，并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不断膨胀，“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也进入了新的阶段。1890年3月，当时任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的山县有朋，在呈给天皇的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

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96页）1895年，山县有朋在《陆军兵制改革奏议》中，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开辟利益线的观点。山县在这里所说的“利益线”，是指同日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利害关系的地方。这就是说，凡是日本军国主义认为同它有利害关系的地方，它就要用武力去“防护”。山县有朋所说的“开辟”、“防护”利益线，具体说，就是要加深、扩大对中国、朝鲜的侵略。这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正式形成。

通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不仅霸占了我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还攫取了从长春至大连、从安东至沈阳的南满铁路的经营管理权，并先后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关东厅”、“关东军”和日本领事馆等侵略和掠夺中国东北的机构。在实施“大陆政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1908年9月25日，日本桂太郎内阁通过了一项关于对外方针政策的决定，其中有关于对华政策的规定：“应扶植我国在中国的势力，一旦该国发生意料之外的事变时，即可确保我国的优势地位，为了使满洲

的现状永远保持下去，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第6页）1921年5月13日，原敬内阁会议通过的《对满蒙政策》规定：“我国在满蒙既得的特殊地位与权益，当然应当予以确保和进行有效的运用，而且对于我国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生活所必需的地位与权益，今后还必须进一步去获取。”（《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第6—7页）此后，日本的这种侵略政策，被正式称之为“大陆政策”。

5、侵华策划与预演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特别是侵略中国东北的实际行动，也在推进。为了制定新的侵华方案，进一步吞并东北、灭亡全中国，日本政府在军阀田中义一的主持下，于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召开了“东方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日本外务省的人员外，还有日本驻华公使和驻中国各地的日本总领事，以及日本军部、大藏省、关东厅、朝鲜总督府等机构的代表。会议的目的，就是策划如何吞并中国东北。对于这一点，当时的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东方会议”的实际主持者森恪后来承认：如果露骨地说吞并东北，可能招致麻烦，所以给它包上了一层“东方会议”的糖衣。会议通过了一项“对华政策纲

领”，其中的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关于东三省地方，由于在国防上与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因此我国应予以特殊的考虑。”第八条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扰乱了治安，当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侵害之虞时，不论来自任何方面，均应保护之。”第五条规定：“当日本帝国在中国之权益，以及旅华日人之生命财产有遭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可采取相应的、断然的自卫措施维护之。”（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册，第101—102页）这就是说，要制造各种借口，乘机侵占东北。

“东方会议”后不久，即同年7月25日，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精神制订了一份秘密文件呈奏天皇，这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关于《田中奏折》，战前日本官方矢口否认有这个文件，战后日本史学界也存在真伪问题的争议，但一致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以这个文件的精神为行动指南的）这份秘密文件歪曲历史事实，称“满蒙非支那领土”，鼓吹“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时事月报》第1卷第2期，1929年12月号）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并吞中国东北、然后以此为基地占领全中国，进而征服世界的野心。

从这时起，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政治上的阴谋策划

活动有增无已。1930年末，日本参谋本部成立了以情报部长（不久后调任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为首的策划侵华阴谋的专门班子。经过密谋策划，制订了一个强调从根本上解决所谓满蒙问题的《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这份秘密文件明确规定分三个阶段，即从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最后完全占领中国东北等阶段，完全解决所谓“满蒙问题”。（《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第389页）1931年6月，日本参谋本部又组成了新的策划阴谋的班子，仍以转任作战部长的建川美次为首，成员有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等。这些人就中国东北问题，反复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最后制订了一个《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个秘密文件全文共分八条，对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措施都做了安排，实际上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

侵略中国东北的急先锋日本关东军，不仅积极贯彻执行上述中央部门的侵略方针，它本身也策划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从1929年起，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祸首板垣征四郎，关东军作战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关东军参谋兼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的副机关长花谷正等人，在关东军司令官的默许下，就已开始进行秘密策划。对有关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各种问题，进行反复、

深入的研究。甚至命令关东军司令部兵要地志主任参谋佐久间亮三，研究和制订一个具体的统治方案。经过一年多的活动，佐久间于1930年9月拟成了《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这份材料明确承认研究此问题的目的，就是“考虑到我国军队将来必定占领满蒙”；“将来通过战争迅速占领满洲及蒙古之一部，完全置于我国势力范围之内，以便为进行长期的对外作战，取得稳固的资源和其他方面的基地。”（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附录，第52—53页）这份材料还对占领中国东北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统治方针和统治形式，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早就下定了侵占中国东北的决心，而且确定了准备实施的具体统治形式。1931年春，以板垣征四郎为代表的关东军司令部，制订了一个《处理满蒙问题方案》。这份秘密文件除了明确表示要霸占中国东北外，还着重提出了“运用直接的方法”、“利用政局发生变化的机会”等解决东北问题的具体实施方式。1931年5月，石原莞尔向关东军提出了一份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个人意见》的报告，全面论述了所谓满蒙的价值，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价值，并对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方法、时机等，提出了具体意见。强调“为了巩固国防，满蒙问题之解决办法，除了将满蒙变成我国

领土外，别无他法”。并要求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依靠计谋，制造机会”，主动解决这个问题。（《石原莞尔资料》，第76—79页）

与政治上进行阴谋策划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致力于造舆论，搞宣传。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煽动侵略中国东北。日本军部向各报刊、电台发布命令，要所有的记者、作家、讲演者，必须进一步调，支持对中国东北采取进一步的侵略行动。在日本军部的煽动下，“樱会”、“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等极右团体纷纷出现，并进行制造侵华舆论的活动。法西斯头目大川周明、板垣征四郎和松冈洋右等，更是活动频繁，不遗余力。在1931年1月23日召开的日本第59届议会上，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发表了题为《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的演说。随后不久，又出版了内容与此相同的小册子。宣称“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是在国防上十分重要，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无论是在国防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栗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67—68页）

同年1月24日，满铁调查科科长佐多弘治郎，应邀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表讲演：“从目前我们日本的国家状况看，如果不获得大量领土或与此相当的东

西，结果就可能被英、美等大国所压倒”；“要建设大日本的超级大国，就必须获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这就需把满洲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现代史资料》7，第134—135页）

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更是极尽煽风点火之能事。1931年3月，他给日本陆军步兵学校的学生，作了一次题为《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演讲，说“满蒙对于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着极为深刻而且特异的关系，当然不能以单纯的经济观点来衡量”；“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单靠外交上的和平手段，归根结底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现代史资料》7，第139—144页）这个讲话稿后来又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布。同年5月29日，在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的一次军官会议上，板垣又发表了“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其结论是：日本的最终目的，是把满蒙变成日本的领土。

在这阵侵略中国东北的鼓噪声中，日本军部的高级将领们也赤膊上阵。1931年4月2日，陆相宇垣一成在一次师团长会议上说：“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单位不够完整，因此解决满蒙问题是不可缺少的。”（《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第388页）把日本缺乏资源这种地理上或经济上的缺陷，作为必须侵占中国东北

的借口。同年5月29日，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一次军官会上说：“满蒙这个地方与帝国的国防及帝国之生存，具有极深的特殊关系，不可以单纯之经济观点视之”；“该地是历代当局者倾注心血，力图解决之所在。对满蒙问题做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帝国崇高使命之第一步。”（《现代史资料》7，第145页）同年8月4日，陆相南次郎在一次军司令官与师团长会议上也煽动说：“满蒙地区在国防上、政治上，并将在经济上同帝国的生存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现代史资料》7，第150页）日本帝国主义者甚至抬出在日俄战争中丧命的军国主义分子的亡灵，作为侵占中国东北的“理论根据”。宣称“满蒙是在明治大帝领导下经过血战、为此牺牲了10万同胞的圣地”，因此有权统治满蒙。

侵略中国东北的军事准备也随之进行。其具体步骤之一是：积极扩大军事工业，以及与军需品生产直接有关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由于日本政府的全力扶植和优先照顾，虽然受到严重经济危机的影响，军事工业以及同军工生产关系密切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不仅没有减产，还有较大的发展。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已经能够生产重型轰炸机、坦克、舰船等重型武器装备。为了保证军工生产的发展，日本政府在经济危机期间，仍然不断增加军费。1930年的财政